

## 我所了解的王力先生

陳振寰

國際關係學院中文系

我是三十八年前認識了一師的。1954年先生自廣州中山大學調到北京大學教書，我當時正在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讀三年級。先生一到北大，全家住在招待所裏，行李都還沒打開，就開始給我們講起了漢語史課。說實話，了一師不是個十分善於言談的人，他講課遠遠談不上繪聲繪色。他是用充實的材料、新穎的論點、嚴密的邏輯征服好學的北大學生的。大家都說王先生的一大優點是善於「搭架子」(建立體系)。漢語史是一門前無古人的開創性課程。當時，能夠作為參考的只有《俄語語法史》，而先生五十歲開始學習俄語，當時才學了三年多，即使俄語史能給他一些啟發，寫漢語史也得自己準備材料，自己提煉觀點，自己搭好架子，總之是一切從頭做起。先生邊研究，邊寫講稿，邊上課。寫一節教一節，教一節改一節，改一節印一節。因此，經常是墨迹未乾便照本宣科，甚至連分段、標點都不時地唸出來，以提醒學生不要記錯了筆記。學生的筆記了一師有時會收幾本看看，一方面檢查教學效果，一方面也可以把課上添補的觀點材料充實到正式印發的講義中去。

1956年的秋天，了一師告訴我他打算收我作他的漢語史副博士研究生，方向是音韻學。我一心想搞文學研究，現在卻釘死了要跟幫滂並明打一輩子交道，心裏委實惴惴不安。我當時坦率地跟了一師說：「我不是不想跟您學，是怕學不好。我想搞文學，又好看雜書，愛好面太寬。搞語言學，特別是音韻學，太枯燥了，我恐怕坐不下來，鑽不進去，最終辜負了您的期望。」了一師笑着對我說：「興趣廣不是壞事，是好事。語言是社會交際的工具，研究語言也就離不開整個社會文化。語言學跟文學、史學、天文、地理、音樂、藝術，乃至數學、物理都有密切的關係。特別是古典文學，研究漢語的歷史能夠離開古典文學嗎？我就是既搞語言又搞文學的。所謂『龍蟲並雕』，就是指的這個而言。」先生諄諄教導我：「搞語言學研究至少要有兩個條件，一個是要有盡可能廣博的知識基礎，另一個是要有科學的理論和頭腦。」他列舉了顧炎武、王念孫、王國維、趙元任等許多古今語言學大師的例子，說他們無不是博通古今、思想縝密、重視理論、講究方法的。他非常感慨地說：「我幼年沒有機會讀中學，沒受過數理化的啟蒙教育，至今深感遺憾。我一輩子吃虧在不懂數理化，否則研究會更深入一步。」先生教育我：「你應該揚長避短，努力克服愛好面廣的人常犯的

淺、浮的毛病，安心讀書，認真思考，將來會有成績的！」這次談話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，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專業道路。

我做了先生的研究生後，先生留給我的第一項作業就是通讀、圈點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並要求做出常用字卡片。我那時還改不掉浮躁的毛病，覺得讀段《注》很苦，因而進度很慢。每星期四上午是先生指定給我的彙報、提問時間，每次去彙報學習情況，心裏總是忐忑不安，因為了一師對人是那樣的和藹，對教學又是那樣的嚴格。一次，我實在克制不住了，就說：「不知這樣讀下去有多大用處？我身體本不算好，照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摳，一輩子能讀多少書？何況，外語的壓力已經夠大的了。」了一師沒有生氣，他耐心地教導我：「對於一個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，有三條很重要，一是基礎，二是外語，三是長壽。沒有廣博而扎實的基礎，除了發空論，甚麼也搞不成。《說文解字注》凝聚着段玉裁半生的心血，既能幫助人讀通《說文》，又有很多發明，是搞漢語史的人最重要的基礎之一，一定要好好讀，真正弄懂它。你要從段氏一字一句箋注《說文》，學習踏實、老實、求實的學風，克服浮躁的毛病。外語是掌握現代理論、知識的工具，也是進行語言比較的材料。最好能懂幾種外語，至少先學好一種。清代的樸學家如果懂外語，我們現在解決的很多問題，他們可能在一兩百年前就解決了。我說要長壽，就是說要注意身體。咱們搞社會科學的，很大程度上要靠資料和經驗的積累，活得越久，書就讀得越多，經驗就越豐富，也就越有可能做出好成果來。我的老師王國維先生聰明絕頂，極有學問，寫了很多東西，可惜死得太早。黃季剛、曾運乾都很有學問，也可惜死得太早。」先生這番話給我很大的震動，既是在說一個普遍性的道理，也是針對我的缺點而發的。

1960年底，我結束了四年的研究生生活。1961年初，我被分配到廣西。按說，我1956年北大本科畢業留校，1957年轉讀研究生，無論依政策還是慣例，讀完研究生後都該留在北大；何況我家在北京，已經結婚。我當然不滿意學校不合常理和人情的決定，但仍然相當自覺，甚至可以說是愉快地登上了南下的列車，這是跟了一師對我的談話分不開的。夏蔚霞師母至今還記得在燕南園60號客廳裏的這次臨別贈言。了一師對我說：「把你分到廣西，系裏徵求了我的意見，我是同意的。我是廣西人，離開廣西幾十年了，不能為家鄉出力，常常感到歉疚。你是我的學生，既然不能留在我身邊，能去廣西工作，也算是替我為家鄉父老盡盡心意吧！再者我的大孩子秦似在廣西師範學院當系主任，你去他那裏，也可以有些照應，我也放心一些。」他又說：「廣西方言、民族語言複雜，是語言的富礦區，在那裏你是可以大有作為的。」我深為先生對家鄉的熱愛、對學生的關心與期望而感動。

了一師是一個無比勤奮的學者。從二十幾歲到逝世前兩個月，六十年筆耕不輟，所著所譯近一千二百萬字。想想看，這用工整的蠅頭小楷清稿的一千二百萬字，如果用四百字一頁的普通稿紙，便是整整三萬張，接起來，長達十公里有餘啊！十年浩劫

當中，燕南園60號小樓被六戶人家瓜分，剩給被強制勞動的了一師的空間，連放置書桌、資料的地方都沒有了。然而，1973年，先生一被解除管制，就立即拿起了筆。我清楚地記得，文革後期我從廣西到北京看望先生，每次都見先生坐在從林燾先生家借來的窄而不長的「書房」的南窗前，埋首於書籍和稿紙的海洋中。先生文革後出版的學術專著，不算《王力文集》，我見過的就有十五種之多；而文革結束那一年，先生已經是七十六歲高齡的老人了！我自己的書房壁上，高懸着了一師手書的《八十自壽詩》，先生說：「漫道古稀加十歲，還將餘勇寫千篇。」在學術戰場上，先生是真正的勇將！

了一師是一個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學者，在漢語音韻學、語法學、詞源學、詩律學、方言學、漢語史、漢語言學史、語言理論以及文學與翻譯諸領域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。然而，先生卻說，自己「先天不足，學術修養很差，特別是自然科學基礎差，以致我的學術成就平平」（《我的治學經驗》，1985年）。類似的話我曾親耳聽過不止一次，說話時先生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。曾經有人在論辯中拿先生的某些看法駁斥和壓制不同意見，先生知道後對我說：「別以為我說的話都是對的，一個人一輩子能發現幾條規律性的東西就很不錯了，哪能句句話都對！」他還對我說過：「我寫了幾百萬字的文章，真正屬於我自己發現的、規律性的東西，也不過幾條而已。例如脂、微分部、遞繫式、上古漢語判斷句可以不用系詞等。」先生說：「人家說我會搭架子，或許是吧，再補充一點，就是我愛動腦子。有人說我做了許多開創性的研究工作，其實我只是想方設法把普通語言學的原理用到漢語研究中去，努力發現漢語本身的特點而已。」

先生勇於修正錯誤，鼓勵別人有不同意見。先生很不贊成那種自己的文章別人動不得、老師的觀點學生碰不得的態度。他接受洪誠等先生的意見，在著作中一再修改系詞「是」的最早使用年代，已是大家熟知的了。他在給楊耐思的《中原音韻研究》所作的《序》中說：「我並不是完全贊成楊耐思同志的結論的，為甚麼我為他的書作序呢？這是因為我應該尊重別人的研究成果。我應該鼓勵我的學生持不同意見。如果墨守師說，學術就沒有發展了。」我的《音韻學》全稿沒有給先生審閱過，但寫作當中，每次進京拜望先生，免不了向他老人家請教。我對音韻學中的某些問題有自己的看法，例如等韻性質問題、調類調值問題、諧聲性質問題、反切起源問題、《切韻》性質問題等等，都跟先生的結論不同，可是先生總是鼓勵我：「只要言之有據，就可以大膽地提出來，讓人家去批評。錯了，改就是了。」